

上海文化研究丛书系列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城市的后面

吴亮 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的后面 / 吴亮编著.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80740 - 644 - 0

I. ①城... II. ①吴...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0667 号

本书系已列入上海作家协会资助项目

主 编

吴 亮

责任编辑

赵光敏 王 珺

特约编辑

张定浩

装帧设计

洪 磊

书名

城市的后面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25

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644 - 0/I · 575

定价

48.00 元

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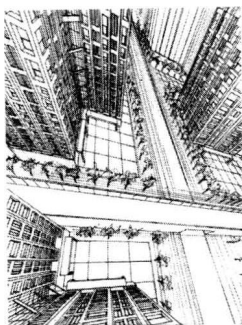
T: 021-65410805

上海文化研究丛书系列

城市的后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吉奥乔·阿甘本 都市	5
瓦尔特·本雅明 马赛的大麻	11
翁伯托·艾柯 论阐释，或成为马可·波罗的难度	18
玛格丽特·L·金 15世纪的佛罗伦萨	25
玛丽亚·塔塔 犯罪、传染与遏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性谋杀案	40
顾 铮 从《上海来的女人》到《伊尔夫逃亡》 日本都市摄影的兴起	56
唐凌洁 新纪实摄影的私人化转向 一个关于“艺术大师”的神话	80
时鸿铭 多重视角下的张才摄影实践考察	90
汤惟杰 上海的秘密政治 20年代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档案阅读札记	110
张屏瑾 东洋的垃圾场 横光利一与《上海》	127
安德鲁·菲尔德 在罪恶之城出卖灵魂 1920—1949年间印刷品、电影和政治中的上海歌女和舞女	139
刘允华 臧否夜行 台湾夜间生活的源流与启示	168
赵 川 二〇〇八，尘土中的剧场	174
赵 川 城市中的气泡	190
莎拉·卓别林 日本情爱旅馆内部设计的演变	200
葛红兵/许 峰 租界时期上海菜场的文化规训与视觉整饬	236
汪民安 为了拆毁而建造	264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接触区的艺术	277



吉奥乔·阿甘本

王立秋 译

许多年前我和居依（·德波）有过一次谈话，我相信那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直到说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居依打断了我：“瞧，我不是哲学家，我是战略家。”这个陈述让我感到惊奇，因为我过去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位哲学家，就像我把自己也看作一名哲学家一样，但我想，他想说的意思是，一切思想，无论它试图变得如何“纯粹”，普遍或抽象，都总要为历史和时间的符号 / 签名 (signs) 所标记，并因此而被捕捉，并在某种程度上涉入某种战略和紧急的情况。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思考无疑是普遍的，而我也不愿进入特定的各种冲突的主题，但我希望这些思考将打上战略的标记。

我要从对都市 (metropolis) 这个词庸常的词源学思考开始。你们知道，在希腊语中都市意味着母亲城 (Mother City) 并涉及城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奇怪的是，一个离开城市去寻找某个 (新) 殖民地的城邦 (polis) 居民被称为 en apoikia：远离 (distancing)/ 疏远 (drifting away) 家乡和城市 (的人)，而这一状态，就其与殖民地的联系而言，也就具备了母亲城的特征，即都市。也正如你们知道的那样，都市一词的这个意义依然通行，在今天它被用来表达家乡的都市领土与殖民地的联系。词源学提供的第一个有启发性的观察在于，都市这个词具有某种强烈的最大限度的脱位 (maximum dislocation) 和空间及政治非同质性的内涵，而这些正是定义国家、城市与殖民地三者之间关系的那种含意。而这，引起了关于当前通行的，作为某种城市的、连续统一的、相对同质的构造 (fabric, 直译即织物) 的都市之观念的一系列的怀疑。这是第一个考虑：把希腊城市定义为一种政治城邦模式的那种法权的平等 (the isonomy)，被排除在都市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之外，因此，都市这个术语，在被转义以用来描述某种城市之构造的时候，也就带上了随之而来的这种根本的非同质性。所以我提议我们还是把都市当作某种实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城邦概念中的城市的

东西，也就是说，某种政治上和空间上的法权的平等。我建议用这个术语，即都市，来指称福柯所定义的从旧制度的领土权力，主权利向现代的生物权力——这种权力在本质上是治理性的——的转变过程中并生出现的那种新的城市构造。

这意味着，要理解都市是什么，就需要理解权力借以逐渐呈现对事物与生者的治理的特征，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权力借以逐渐呈现经济特征的那个过程。在18世纪，经济就意味着治理，对生者与事物的治理。旧制度封建体系中的城市，在于广大的领土权力的关系中永远处于某种例外的状态，它是 *citta franca*，相对脱离于大的领土权力而自治。¹ 因此，我要说，都市是在权力变成对生者与事物的治理的时候取代城市的装置 (*dispositif*) 或装置群。

我们不能深入权力向治理的转变的复杂性。治理不是支配和暴力，它是一种更为极间性 (*complecx?*) 的配置，这种配置贯穿了被治理者的本性因此也暗示着它们的自由，治理是一种非超越而内在的权力，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永远是，就其特定的展示而言，一种并行 / 附带 (*collateral*) 的效能，某种起源于普遍经济却堕入特殊 / 个别的東西。在美国的战略家们谈论他们不得不在严格意义上承担的附带损害 (*collateral damage*) 的时候：治理总是具有这种普遍经济的图式，同时对个别，对主体，产生附带的效能。

回到都市。我的想法是我们面对的不是旧城市的发展或成长的过程，而是一种新的范式的建立，而这种范式的特征，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无疑，其主要的特性之一在于，存在一个从基于某个中心，也就是说，某个文化中心或 *agora* 的城邦模式，向一种新的都市的空间化——当然它也参与（被投入）了某种去政治化的过程——的转变，这种转变导致了一个奇特区域的出现，在此区域中，要决定何为私人何为公共是不可能的。

米歇尔·福柯试图对这种与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相关的城市空间的一些核心特征作出定义。根据福柯，这两种迄今为止一直泾渭分明的范式之间存在某种集合：麻风病与瘟疫。麻风病的范式清楚地基于排除，它要求麻风病人被“放到”城市“之外”。在此模式中，纯粹的城市维持了更为陌生的外在，大封闭 (*the grand enfermement*)：封闭且排除。² 瘟疫的模式与此截然不同，它引出了另一种范式。在城市染疫的时候，要把瘟疫的受害者移到城市之外是不可能的，相反，这种情况下，某种监视、控制和鉴别城市空间的模式被创造了出来。这些空间被分为多个地区，在每个地区内，每条街都被迫自治并被置于某个监督官的监视之下；没有人能出门但每天每个屋子都要被检查，每个居民都要受到管制，那里有多少人，他们死了没有，等等。这是一种（对）为监督官、医生和士兵所监视的城市领土的分区治理 (*quadrillage*)。因此在麻风病人为某种排除的装置所拒斥的同时，瘟疫的受害

者却通过一种（产生）区分和个体化（作用）并于此同时接合 / 表达控制与权力之效率的装置的复杂网络而被包围、监视、管制和治愈。

因此在麻风病是一种排除性社会的范式的同时，瘟疫则是一种规训技艺，将使社会经历从旧制度到规训范式之转变的技术的范式。根据福柯，现代性的政治空间是这两种范式的结果：在某个点上麻风病人开始被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这里出现了一种监视、控制、个体化和规训权力之接合 / 表达向麻风病的排除与分离框架的投射，这样，情况也就变成了：通过把麻风病人当作瘟疫的受害者来对待而使之个体化、主体化并纠正（其作为）。因此这里存在一种双重的捕捉：一方面是疾病 / 健康，疯狂 / 正常等的简单二元对立；另一方面则是一系列复杂的技术与装置的分化型设置，而这些技术与装置，则（起到了）主体化个体并控制主体（的作用）。这是今天都市空间之普遍定义的第一个有用的框架，同时它也结识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那些有趣的东西：明确地界定边界、围墙、空间化的不可能性，因为它们在这种分化范式行动的结果：不再是某种简单的二元划分，而是一系列复杂的、接合 / 表达性的、个体化的过程和技术。

我还记得 2001 年的热那亚：我想那是一次处理旧城市的历史中心——后者仍以古代的建筑结构为特征——实验，以便发现在此中心人们是何以能够突然地创造出不仅具备排除于分离功能，而且也服务于接合 / 表达不同的空间以及个体化空间与主题的目的的门和墙。这种福柯概要性地勾勒出大概的分析，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但在这里我想指出并集中于另一个不同的方面，以这点作结。

我说过，城市是一种装置，或装置群。你们早先提到的那种理论是这样一种总结性的观念：即人们可以把实在分为，一方面，人与生灵，以及，另一方面，持续捕捉、紧握他们的装置。然而，定义装置的第三种基本元素，在福柯和我看来，是作为个体与装置之间关系，或 *corpo a corpo* 的那一系列的主体化的进程。没有主体化进程就没有装置，谈论装置就必须面对主体化的进程。主体意味着两件事情：把个体印象承担并系于某种个体性和独特性的东西，但同时也是对某种外在的力量的征服，不存在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主体化进程。

通常缺乏，但也是在运动中的，是对这种关系的意识，对每一次承担某种认同 / 同一性的时候，同时也被征服的意识。显然，这也因这样一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即现代的装置不仅是某种主体性的创造成为必然，而且也同等地必然导致去一主体化的进程。情况可能一直以来都永远是这样，想想今天我们还在经验的，塑造了西方主体性的忏悔（对罪的形式性的告解），或司法上的供认（或坦白）。忏悔总是在对某个主体的创造中同时也使对某个主体的否定成为必然，比如说在罪人与忏悔者的形象之间，很显然，某种主体性



的假设与某种去主体化的进程是并行的。因此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装置的去主体化愈演愈烈，因此要辨认出它们创造的主题化进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但都市也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在这里，一个巨大的主体性的创造（过程）正在发生。关于这点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在我说我们需要认识这些过程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社会学或经济或社会的分析；我指的是对主体的行动能力 / 权力（力量）进行质疑的本体论的层级，或者说斯宾诺莎式的（分析）层级；也就是说，（我们要分析的是）在一主体借以以某种方式系于某种主体的同一性 / 认同的过程中，引起某种变化，使他 / 她行动力增加或减少的那种东西。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知识，而这也许也是使我们今天见证的都市冲突尤其晦暗不明的原因。

我认为，与都市装置的对抗，只有在我们参透 / 穿越那些都市以一种更为组织缜密的、更为深刻的方式使之成为必然的主体化过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为我认为冲突的结果（输出）依赖于此：依赖于为达到那种我将称为不可治理性点（a point ungovernability）的阶段而在主体化进程上采取行动和干预这些进程的权力 / 力量。那不可治理者——在这里，权力会在其治理的形象中翻船——我设想的不可治理者永远是所有政治斗争的开端和路线。

译自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p/fpagamben4.htm>

1 Citta franc 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是对封建税役的免除（franca=free 即自由，这是一个很好的习语：farla franca，“离开它”）。

2 这些思考可以从米歇尔·福柯 1975 年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说《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中找到，1 月 15 日的第二次演说特别处理了这个问题。1975 年演说的英文版已由 Verso 出版社翻译为 The Abnormals 出版（London: 2003），法文原版由 Gallimard（Paris: 1999）出版，而意大利文则为 Feltrinelli（Milan: 2000）出版。这是一部很棒的著作。



瓦尔特·本雅明

孙云龙 译

引言：大麻开始发挥效力的最初标志之一，“是预见性开始钝化，有一些不适；陌生的，无法回避的事物逼近眼前……一幅幅图画和由之形成的序列，长年来沉寂的记忆重新浮现，所有场景和境况全然当下化，在最初阶段会激发起兴趣来，间或伴随欢快，最终，如果没有发生任何转变的话，将会使人精疲力竭，并陷入忧伤。首先，人们会对这一切感到骇然不已甚至眩晕，包括他们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们的笑声，以及各种表达对他们自己来说如同外在事件。他们也由之获得如此体验，灵感和启示在其中若隐若现……空间可以不断延伸，地面也变得陡峭起来，关于空气的全新感受：薄雾冥冥，视线模糊，感到空气的重量；色彩变得明快起来，熠熠生辉；事物看起来更漂亮，抑或更加硕大可怖……所有这一切并非连续地进展着，毋宁说是在梦境与清醒之间不停地切换，吸食者在全然不同的两种意识状态中被抛来抛去直至衰竭；这种切换甚至可以发生在一个句子的中间……迷醉中的吸食者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远悖于规范形式的汇报。由于记忆频繁地与先前事件断裂开来，我们就很难从其中察觉到总体的关联性，思想并未形成语言，吸食者会不可救药地陷入到狂喜之中，他们经常会持续几分钟喜不自胜，除了嬉笑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关于迷醉的记忆令人惊异地清晰”——“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大麻的毒性尚无试验加以深入研究。关于大麻至幻的最重要表述来自于波德莱尔（人造天堂 *Paradis artificiels*）。”出自约尔和富兰克尔：《大麻迷醉 *Der Haschisch-Rausch*》，医疗周刊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1926. V. 37。

马赛，7月29日。晚上七时许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我吸食了大麻。白天的时候我还在埃克斯。现在我倒在床上心无旁骛，这里是千万座陌生城市中的一个，没有一个熟人，也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搅好梦。但事实上我却被一个小毛头的哭闹声搞得心神不宁。我以为他

已经吵了三刻钟，其实不过只有二十分钟……我从床上坐起来，读书，抽烟。正对着我映入眼帘的是马赛城的腹地。我熟视无睹的那些街道变得有如刀切斧劈般支零破碎。

我决定离开客栈，大麻的效应看起来有些平息了，或者说也该平息了，我不应该再小心翼翼地在家里呆下去。第一站是坎纳比尔街与贝尔松路街角的咖啡馆。从港口望过去右边的那一家，并非我熟悉的咖啡馆，现在又怎样呢？我巴望着确定的善意，看到人们亲切地招呼我。想到这些，孤独感迅即舍我而去。我的手杖开始带来特别的喜悦。人们会变得如此柔情款款：害怕落在纸上的阴影伤害了它。——呕吐感不再。人们在读着小便池上的告示板。如果有人冲我过来，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没人这样做，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就是觉得这里有些太吵了。

现在，大麻吸食者要求的时空环境开始发生作用。如我们所知，这绝对是皇宫贵族的气派。对于吸食者来说，凡尔赛宫并不大，永恒也并不长久。在这内体验的无限维度之上，在绝对的绵延和无垠空间中，驻留着美妙的惹人狂喜的幽默，它更爱这时空世界中的偶然性。当我在巴叟饭店获悉他们温暖的厨房刚刚停火时，我正在无限地体验着那份幽默，此时我已让自己加入到永恒的盛宴之中。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这一切都明快起来，阵阵心悸，生动异常，这一切将常驻不逝。在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我是如何找到位子的。对我来说老港口的景色是至关重要的，从上面一层可以望得见。我在楼下侧身而过时瞥见二楼阳台上还有一张空桌，因而我便朝那边径直过去。靠窗的位子大多都有人了，只有一张大桌子还空着，我旋即走过去。等到我安然入座的那一刻，忽然发觉坐在如此硕大的桌子旁是那么不成比例，羞耻感让我匆忙起身转向二楼的另外一端，那里有一张小桌子可以容身，它是在我走到它身边时才跳入眼帘的。

晚饭吃得比较晚。我先去了港口边的小酒吧。当时我又一次陷入到恍惚之中，隐约听到那边正在进行着一场音乐会，好像是管乐合奏。我曾试图劝说自己，那不过是汽车喇叭的哀嚎。在通往老港的途中，我又一次感受到这美妙的轻快，连同步履的真切，它把我脚下大广场上那不可言表的石质路面，变成我——这个精力充沛的漫游者——在夜间时时造访的乡间小路。此时我还须避开坎纳比尔街，我对自己的约束力还没太大把握。在那个港口小酒吧里，大麻开始施展它典范式的魔法，它带来一种原始而又尖刻的游戏，这在我此前的经验中从未有过。也就是说，它把我变成了相面师，至少是面相观察者，我发觉经验中有些完全独特的东西：我的视线紧紧咬住身边的一张张脸，这些脸大多是因其粗糙和丑陋而变得愈发醒目。通常状况下，我有双重原因来回避这些面孔：其一我不想吸引他们的注视；其二我不想忍受它们的粗俗。感觉上港口那个小酒馆被推向更远的地方了。（我相信，它处于我无须冒险所能够抵达的最远端，这段距离是在我迷醉中以如此这般的确实

性度量出来的，便如同人们在精疲力竭时仍然知道如何将水倒至杯缘而滴水不漏，当然在严格意义下没人能做得到。）现在距离布特里街尚有段距离，但也没有布尔乔亚住在这儿；顶多在真正的港口无产者的邻居中混杂着几个小布尔乔亚家庭。瞬间我参悟透一个道理，对于一位画家而言——难道对于伦勃朗或其他画家而言不是如此这般发生的吗？——丑是如何显现为真正贮藏着美的容器，更确切地说如同珍宝箱，如同那些蕴藏着美之金矿的参差山峦，透过层峦、注视和叠嶂，金子在遮蔽中熠熠生辉。我特别记起一张无边无沿的如动物般粗陋的男人面孔，在这张脸上突然冲撞出一张《弃权声明书》。吸引我兴趣的首先是男人的脸。接下来就是那个经久不衰的游戏，从每一张脸上都浮现出我所熟悉的面容，有时我能想起他们的名字，有时又不能，这种错觉如同在梦魇中消逝，毫无困窘和自惭形秽，而是如同一个恪尽职守的存在者那般保持着平静和友善。这种境况与孤独毫无相干。我对自己而言已然是一个社群了吗？当然这也并非昭然若揭。我怀疑这是否成为令我备感幸福的理由，抑或如此表达更恰当：我成为自己的皮条客，老练、温情且厚颜无耻，我藉由一种模棱两可的承诺引领着自己，仿佛这承诺出自于一位深谙雇主心愿的业界老手。——然后进行的是半个永恒，直至服务员再次出现。或者，毋宁是我等不及他的出现，便径自走向吧台付账。在这类酒馆中是否该给小费，这一点我并不确定。不然的话我无论多少也会给点儿的。然而昨天在大麻的作用下，我像真正的吝啬鬼；我因怕出手奢华而引人注目，但实际上我的确让自己成为了焦点。

在巴叟饭店时也同样难堪。我先点了一打牡蛎，服务员却想让我马上再点下一道菜；我要了当地某个特色菜，他却回来通知我说已经全部卖光了。于是我便在菜单上就近找了起来，我想要把所有的菜肴依次点一遍，而列在上面的另一个菜名马上又吸引了我，如此这般，直至我扫至菜单的顶部。这并不仅仅出于饥肠辘辘，更是出于一种真挚的礼貌，我并不想因没点它们而冒犯这些菜肴。书说简短，我最后停在了里昂馅饼上面。狮子馅饼²，想到它时我面带诙谐的笑容，当它干干净净地躺在盘子里摆在我面前时，略带轻蔑：那些温顺的兔子肉和鸡肉——管它们什么肉。对于我那像狮子一般的饥饿而言，用一头狮子来喂饱它并不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此外，我还在内心暗下决定，一旦在巴叟吃完晚饭（差不多要十点半），我就去再找个地方吃第二顿。

就在去往巴叟的途中，我沿着码头信马由缰，挨个念着停在那儿的船名儿。这给我带来无以言表的愉悦，我依次晒笑着所有这些法国名字，在我看来，透过这些名字而许诺给船只的爱，精美绝伦，感同身受。只是一艘名为“空军2号”的让我想起了战争，我不太友好地匆匆走过它身边，恰如在刚刚离开的那个酒吧里那样，必须在夸张扭曲的表情和众目睽睽之下匆忙离开。

当我坐在巴斐的楼上往下张望时，老一套的游戏再一次上演。港口前的广场犹如我的调色板，幻想与实存的景物混调在一起不分彼此，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尝试着各种组合而不追究结果，就像一个画家在调色板上做着白日梦。我犹豫着是否应该点红酒。事实上我要的是半杯黑醋栗酒。杯中浮着一个冰块。它们与我的大麻相处十分相宜。我选了紧挨着窗口的位子，通过打开的窗口我可以向下瞥见黑魑魑的广场。当我的目光不断地对广场进行巡视时，我注意到它有一种倾向，随着踏入广场的人而自我变幻，恰如它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人物，毫无疑问，在这个人物眼中他与广场毫无关涉，然而在17世纪的那些伟大的肖像画大师眼中却有不同，为了彰显人物的高贵品质，他们会把被描绘者置于柱廊或窗户之前以便突出形象。没过多久，我在四下张望中注意到这样一句话：“沧桑百年，事物愈发分崩离析。”

这里我必须做个一般性的说明：大麻幻觉所产生的孤寂也有它的负面效果。仅就生理而言，刚刚在港口酒馆时的瞬间，横膈膜就感到一阵阵强烈的冲击，而我试着通过哼歌来缓解这一切。毫无疑问，真正的美和启示尚处于昏沉之中，但另一方面，孤寂如同过滤器一般再次发挥着效用。人们在第二天写下的记录就不会仅仅像一本关于印象的流水账；在夜色中大麻产生的幻觉用棱镜般美妙繁复的花边切断与日常现实的联系；它形成了一种便于追忆的形象。我更愿意说：它萎缩坍塌并形成一朵花的形状。

为了解开大麻迷醉的谜团，人们应该想想阿里阿德涅的线团³。仅仅是把线团松开这一动作中就蕴含着何等欢乐。这一欢乐在深层上与大麻的快乐同根同源，恰似创造的快乐。我们不断前行；不仅探究我们置身其中的洞穴构造的盘亘错节，还享受着另一种发现的愉悦，它源自伴随线团的打开而产生的富有韵律感的极乐。当我们试图打开那个精妙盘结的线团，并具有如此确定性时——这难道不是属于每一种创造力的极乐吗？至少散文是这样。在大麻的迷醉中我们就是那欢快散文的最高形式。

在我抵达坎纳比尔街上的一个与帕哈迪斯路交汇的小广场之后，一阵阵沉溺荡漾的幸福感袭来，与此前所有的欢乐相比，它很难被回忆唤醒。庆幸的是我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人们应该照着这把勺子在现实中做出一模一样的来。”几周前我从约翰内斯·严森那里摘录了另外一句，它们看起来说的是类似的事情：“理查德是这样一个人：他能理解世界上所有同质的事物。”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它使我能够直面这句话中为我度身定做的政治—理性意义，在那些个体化和魔幻化的往昔经验中，我与它遭遇。在我看来，严森的那句话似乎是在说，事物如我们所知的那般存在，完全被机械化、理性化，现如今特殊的存在仅埋藏于细微差别之中，这一最新的洞察全然不同于其他观点。因为我只关注细微的差异，尽管它们的确没差别。我深深地陷入到对眼前石子路的沉思中，透过一种仿

佛是被我涂上的软膏，它们便同巴黎的石子路一般无二。人们常常说用石头代替面包。现在这些石头对于我的狂想而言恰如面包，它忽然间变得饥肠辘辘，想要品尝来自所有地区所有国家的同质性。于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我现在坐在马赛，带着大麻的迷醉，在这样的夜晚又有谁和我在这儿分享这份迷醉呢，知音难觅。无论我对即将到来的不幸和孤独何等无能为力，大麻却一直守在这儿。附近一家夜总会传出来的音乐开始在迷醉中唱主角，这正是我在寻觅的那家。G 驾着一辆马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这在顷刻间发生，正如早些时候离开船只的阴影时，U 猛然与港口流浪汉和皮条客的形象撇开干系。这儿不仅有一些熟悉的脸，在迷幻的场景中，两个身影——一个市侩，一个流浪汉，据我所知——如同“但丁和彼特拉克”般向我走来。“一切人类皆兄弟”。如此便展开一条思绪之链，我明知自己已不能再追踪它了，可以确定的是，最后的环节肯定不会比最初的环节更陈腐，它可能会导向一幅动物的图画。

“Barnabe”几个大字竖立在有轨电车上，它在我端坐的广场前靠站，在我看来，圣徒巴纳巴斯⁴的凄凉故事对于一辆驶向马赛郊区的有轨电车而言，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目的地。歌舞厅门口正在上演的一幕美极了，一位身着蓝色丝裤闪亮紫色丝夹克的中国人走进走出，他是门童。姑娘们在入口处搔首弄姿。我对这一切心满意足。有趣的是，一位年轻男士和一位身着白衫的女孩冲我的方向过来，我就必须如此这般地想：“她在里面刚刚甩掉他，现在他又把她重新领回去。不错，不错。”我被这样一个想法恭维着，我坐在这儿，在一切浪荡形骸的最中心，“这儿”不是指城市，而是这片狭促且并不多事的小地块，在这儿我遇到了我自己。但事情毕竟如此这般地发生了，万物之现象用魔杖触碰着我，我便陷入到它的梦乡中。在那几个小时，人们和事物表现得像是镶着玻璃的锡盒中由接骨木髓做成的舞台布景和小人，当锡盒上的玻璃被擦拭时，就会通电，接着在任何时刻都会在事物间展开最不寻常的联系。

我把此间忽隐忽现的音乐称为爵士乐的稻草棒。我也全然忘却，出于何种原因我开始用脚来跟随它敲打节奏。这与我的教养完全背离，若不是内心一番争辩，这一切是绝然不会发生的。有一段时间，声音输入的强度会排斥其他一切。在这个小酒吧里，所有一切忽然淹没在噪音之中，不是那来自街上的声音。关于这些噪音最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听起来完全像方言。对我来说，马赛人说的法语骤然变得不怎么好听。他们仅滞留在方言的水平。这里所涉及的异化现象，一如克劳斯用精美的语句所表达的那样：“你越是盯着一个字看，这个字倒同你越发陌生起来，”看似一直延伸到视觉。无论如何，我在自己的摘录中发现了这样一句惊人的评语：“事物何以如此经受得住人们的注视。”

当我穿过坎纳比尔街，转过拐角赶赴贝尔松路上那家小咖啡馆去吃冰激凌时，大麻的